区域国别

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及其联盟化：缘起、目标及影响

王金阳

［内容摘要］ 冷战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频繁污名化中国。随着大国网络信息技术博弈加剧，美国进一步将这种“污名化”延伸至网络安全与人工智能领域，旨在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从而巩固其霸权地位。本文通过对美国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伏特台风”相关报告等文本的梳理分析，探究美国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构建的背景、作用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国内层面，美国试图构建“虚假信息行动”联盟转移国内民众对政治矛盾的注意力，影响其对华认知，同时深化政商之间的利益勾结。在区域层面，美国企图影响欧洲与亚太国家民众的对华认知，从而在叙事域、认知域等方面阻碍这些国家与中国发展关系。在全球层面，美国在多个议题领域加强亚太联盟体系与北约组织的联动关系，加速北约“亚太扩员”进程，对国际政治格局与全球合作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中国需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数字时代的国际信息治理改革，以此应对美国“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趋势。

［关键词］ 虚假信息行动　联盟化演变　网络霸权　美国安全战略　对华负面认知

［作者简介］ 王金阳，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15(2025)03-0048-22

2024年4月15日，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伏特台风”——美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国企和纳税人的合谋欺诈行动》报告，报告指出，

“五眼联盟”国家网络安全部门联合报告中所称的具有中国背景的“伏特台风”,[①]系一个无国家背景支持的勒索病毒组织,而美国对其溯源的“证据链”存在明显伪造与篡改痕迹。[②] 2024 年 7 月 10 日,北约发布《华盛顿峰会宣言》,提出北约将联合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等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和“虚假信息行动”的合作,以此反制中国传播的虚假信息以及网络攻击行为。[③] 美国自污名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来,通过联盟化手段频繁发起涉华“虚假信息行动”,遏制中国的趋势愈发显著。

当前学术界关于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演变的研究尚显不足,且对于“虚假信息行动”与“污名化”行为之间的界限至今仍未达成共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包括:第一,“污名化”与“虚假信息行动”的内涵及其演变。第二,从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到“伏特台风”事件的联盟化构建,再到北约发布《华盛顿峰会宣言》,在此过程中,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的发展脉络、目标实践及影响。

一、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内涵及联盟化发展脉络

有学者提出“污名化”扩大的内涵或外延即为“虚假信息战”。[④] 本文认为,在概念上,“虚假信息行动”与“污名化”行为存在差异,尽管两者在政治领域存在诸多重合之处,但“虚假信息行动”不仅将“污名化”行为延伸至网络安全、情报信息等领域,还丰富了其“证据链”的内涵并应用到经济、军事、情报等多个领域。对“污名化”行为与“虚假信息行动”的概念辨析有助于剖析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

① America's Cyber Defense Agency, “PRC State-Sponsored Actors Compromise and Maintain Persistent Access to U. 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ebruary 7, 2024, https://www. cisa. gov/news-events/cybersecurity-advisories/aa24-038a.

②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伏特台风”——美国情报机构针对美国国会和纳税人的合谋欺诈行动》,2024 年 4 月 15 日,https://www. cverc. org. cn/head/zhaiyao/futetaifengCN. pdf。

③ NATO, “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July 10, 2024, https://www. nato. 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 htm.

④ 刘鸣:《美国涉华“虚假信息战”建构、演进与效应——以特朗普政府为例》,《战略决策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91 ~ 112 页。

动”联盟化的演变进程。

（一）美国“污名化”与涉华“虚假信息行动”内涵

“污名化”作为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便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社会中的“污名化”行为。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污名化”意指个体因无法获得社会完整接纳，诸如身体残缺者、精神病患者、吸毒者等，其自我形象持续与强加于身的负面标签相抗争。[①] 而在国际关系中，国家的“污名化”行为通常指一国因对他国战略行为不满，而对其战略行为进行片面解读、负面报道，以此在国际社会中塑造不利于他国的负面形象，削弱其战略行为的国际认可度。[②]

“虚假信息行动”则是指以误导他人为目的，故意传播以操纵真相和事实的策略集合。劳伦斯·马丁·彼特曼最早明确阐述了这种策略，苏联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将“虚假信息行动”作为政治策略予以实施。[③]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科技的发展，“虚假信息行动”演变为恶意编造并传播针对个人、社会组织、机构及国家的错误与不真实信息的行为，旨在污损其声誉。[④] 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凯特·斯塔伯德提出，“虚假信息行动”是一场运动，是一系列为政治目的而产生和传播的欺骗行动和叙述。虚假信息通常具有恶意和欺骗性，传播形式多样，包括阴谋论、图像操纵、视频或音频剪辑等。[⑤] 2019 年，美国国务院对“虚假信息行动”进行官方界定。虚假信息被广泛定义为有目的地散布旨在误导或伤害的信息，基于概念定义，很难将虚假信息归因于精确的参数。比如，虚假信息并不总是由捏造信

---

① Erving Goffman,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Harmondsworth: Pelican Books, 1968, pp. 3 ~ 7.

② 游启明：《国家污名化策略何以成功？——基于美国污名化苏联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4 年第 3 期，第 66 ~ 88 页。

③ Elena Broda and Jesper Strömbäck, “Misinformation, Disinformation, and Fake News: Lesson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 48, No. 2, 2024, pp. 139 ~ 166.

④ Ireton Cherilyn and Posetti Julie, “Fake News” and Disinformation: Handbook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aris: UNESCO, 2018, pp. 44 ~ 45.

⑤ Kate Starbir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are Murky Blends of Truth, Lies and Sincere Beliefs-Lessons from the Pandemic,” https://theconversation.com/disinformation-campaigns-are-murky-blends-of-truth-lies-and-sincere-beliefs-lessons-from-the-pandemic-140677.

息构成,它可以由真实的事实组成,但却在拼凑后形成扭曲受众的看法。[①] 近年来,在中美认知战加剧的背景下,美国针对中国开展的“虚假信息行动”,旨在通过传播阴谋论,联合以美国为主导的国家和组织,在对华策略中频繁运用虚假信息干扰地区政治格局,同时借助新兴技术手段制作、散布,借此扩大虚假信息的影响力。这些行动主要通过伪造和篡改“证据链”来诋毁中国形象,[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构建对中国的负面认知框架,进而扭曲全球民众对中国国际形象的真实认知。

国内外学者对于“污名化”如何演变至“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的探讨较为碎片化。美国学者在探讨本国信息战略时,多从维护霸权、应对新兴国家挑战角度出发,强调信息优势对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支撑。如约瑟夫·奈将“软实力”理论延伸至信息领域,提出信息革命将使各类依托信息网络技术的非政府组织拥有跨越领土边界的能力,强调信息操控引导国际舆论、塑造他国认知的力量;[③]部分欧洲学者聚焦欧盟与美国的网络安全关系,并重点关注网络安全规范,他们认为尽管欧盟与美国在网络安全关系中保持合作与协调,但是双方仍存在广泛的政治分歧,具体表现为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单边行径对美欧关系的消极影响,以及如何构建恰当的网络安全原则和规范来约束信息战中的恶意行为。[④] 而国内研究多是从网络安全技术解读美国网络武器(如“舒特”系统、“清洁网络”计划、“震网”事件)的攻击原理与隐蔽手段,揭示其背后军事、情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⑤] 传播学领域的既有研究主要分析了美国通过社交媒体、新闻机构散播虚假

---

① Christina Nemr and William Gangware, “Weapons of Mass Distraction: Foreign State-Sponsored Disinform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March 2019,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05/Weapons-of-Mass-Distraction-Foreign-State-Sponsored-Disinformation-in-the-Digital-Age.pdf.

② Michael Landon-Murray, Edin Mujkic and Brian Nussbaum, “Disin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U.S. Foreign Policy: Impacts and Ethics in an Era of Fake News, Social 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ublic Integrity*, Vol. 21, No. 4, 2019, pp. 512~522.

③ 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Evolution of a Concept,” *Journal of Political Power*, Vol. 14, No. 1, 2021, pp. 196~208.

④ Dimitrios Anagnostakis, “The European Union-United States Cybersecurity Relationship: A Transatlantic Functional Cooperation,” *Journal of Cyber Policy*, Vol. 6, No. 2, 2021, pp. 243~261.

⑤ 傅群忠,周恭喜:《“舒特”系统攻击机理分析及应对措施研究》,《国防科技》2012 年第 6 期,第 29~32 页;江天骄:《全球网络空间的脆弱稳定状态及其成因》,《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 年第 2 期,第 129~154 页。

信息,操纵国际舆论的话术与传播路径;[①]部分国际关系学者将“虚假信息行动”置于全球地缘政治博弈框架内,探讨美国如何借此打压对手、巩固同盟,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②] 但现有研究更多聚焦于美国信息战的静态研究,对从“污名化”到“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这一动态演变的系统性、综合性研究尚显不足,尤其是结合案例全方位解析其运作机制与联盟化构建的成果有待丰富。

在“污名化”与“虚假信息行动”定义与范畴的探讨中,后者实为前者在网络安全、情报信息领域的升级和拓展。“污名化”强调以任何形式扭曲公众他国形象认知,“虚假信息行动”则以恶意拼凑的信息处理技术达成扭曲认知的目的,可见,后者更依赖对“证据链”的深度伪造技术。而美国网络、情报霸权的优势地位以及深度伪造技术成本低、难识别的特性进一步推动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构建。

(二)从对华“污名化”到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的发展脉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多年来,美国主流媒体、智库、政府官员等总是不遗余力地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质疑、恶意诋毁。Factiva 道琼斯新闻数据库作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化新闻资讯库,囊括了全球最全、覆盖最广的新闻资讯来源,因此本文选择它作为语料检索平台。由于美西方媒体自 2015 年后开始聚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本文选择 2015 年至 2024 年为研究的时间范围,并以最具国际报道传播度之一的《纽约时报》以及善于报道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华盛顿邮报》为研究对象,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One Belt One Road”“China Road”“China Belt”“China Initiative”为主要关键词进行检索。经初步统计,在删除重复、与主题不相关或相关性弱的新闻报道后,本文共获取有效报道 288 条,按照新闻发布时间的统计结果如下:2015 年 7 篇、2016 年 20 篇、2017 年 76 篇、2017 年 67 篇、2019 年 46 篇、2020 年 23 篇、2021 年 15 篇、2022 年 11 篇、2023 年 18 篇、2024 年 5 篇(见图 1)。本文根据对标题、标签中高频关键词的归纳统计,内

① 胡泳、刘纯懿:《战争中的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武器化与数字化战争的到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3 年第 6 期,第 131 ~ 150 页。

② 蔡翠红:《中美关系中的网络政治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76 ~ 98 页。

容偏负面的报道数量居多,内容主要以“一带一路”倡议制造“债务陷阱”、“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对外投资“有违原则”“不遵守国际环境标准”,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容易滋生地方腐败等为主(见表 1)。而由新闻发布趋势来看,2017-2020 年间,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达到峰值;此后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全球普及,高选择性媒体环境使美国将“污名化”拓展至人工智能、网络安全领域,传统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整体呈下降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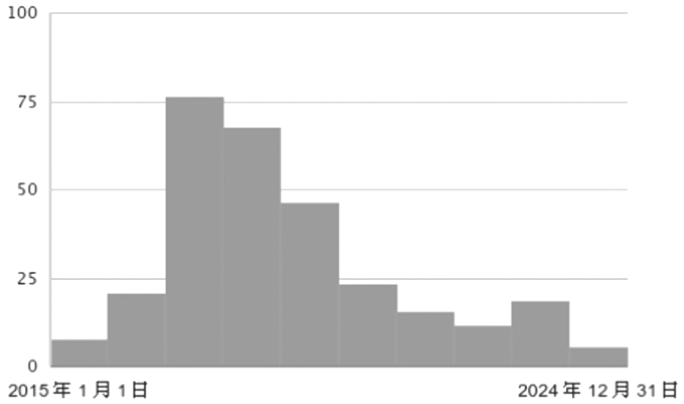

图 1　2015-2024 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报道数量趋势

资料来源:据 Factiva 道琼斯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报道量统计,参见 https://global.factiva.com/。

表 1　《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对“一带一路”报道负面主题、标签及其频次

时间	检索内容	报道主题中偏负面释义
2015-2024 年	“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	战争(52);影响(17);施压(14);威胁(13);军事(12);安全(12);政治(12);债务(11);气候(10);市场(8);野心(7);借贷(6);危机(6);竞争(6);忧虑(5);担忧(5);角逐(5);疑虑(5);挑战(4);批评(4);监视(4);挑衅的(2);借方(1);危险的(1);腐败(1)

资料来源:根据 Factiva 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检索内容筛选,以 288 个数据样本进行主题聚类获得负面释义频率,参见 https://global.factiva.com/。

除媒体报道外,美国政府官员演讲、政府机构报告中也充斥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例如,美国前副总统迈克·彭斯曾多次发表演讲,污名化“一带

一路”倡议;[①]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印太战略报告》中,污名化“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重塑世界经济秩序、输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手段,[②]污蔑中国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腐败等问题;[③]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库发布的“中国‘一带一路’评鉴”中指出,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工程会导致当事国陷入债务危机,并且存在丧失控制权、缺乏透明度等问题。[④]美国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污名化”行为,施行主体以美国政府机构、政府官员、大众媒体、专家学者为主,对华“污名化”行为偏向以单边形式引导国际社会形成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以此达成其战略目的。

人工智能及数据样本普及推动了信息传播模式由传统单向灌输向多元互动转变,进一步改变了美国在认知域、叙事域竞争中遏制中国的模式。首先,美国将对华“污名化”扩展至人工智能与信息传播等领域,将网络空间作为“虚假信息行动”战场,便于深度伪造虚假信息“证据链”。其次,施动主体转变为北约与亚太盟国协同以及“五眼联盟”等美国构建的小多边联盟平台。其中,“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构建使内部协作更加紧密,技术共享与人员交流更为频繁,行动策划与执行愈发精细,各国依据自身特长分工明确:美国凭借顶尖网络技术与情报分析能力,主导虚假信息的策划与核心技术研发;英国发挥其深厚的国际舆论操控经验,负责包装虚假信息,使之在国际舆论场更具说服力;澳大利亚、新西兰利用地理位置优势,监控亚太地区网络通信节点,为虚假信息搜集片面材料;加拿大则侧重于配合美国国内安全机构,在北美地区防范虚假信息“反噬”,同时为跨国行动提供后勤保障等支持。在此过程中,美国盟国出于对美国网络霸权、情报

① Ben Westcott and Nanlin Fang, “China's Billion-dollar Belt and Road Party: Who's In and Who's Out”, CNN, April 26, 2019, https://edition.cnn.com/2019/04/26/asia/belt-and-road-summit-beijing-intl/index.html.

②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③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7.pdf? ver = CnFwURrw09pJ0q5EogFpwg%3d%3d.

④ Daniel Kliman,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et al.,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April 8, 2019, https://www.cnas.org/publications/reports/beltandroad.

霸权等优势地位的战略需求,它们对“虚假信息行动”更倾向于配合与积极参与,共同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演变。例如,微软公司在未公布归因溯源的情况下,将“Spamouflage”污蔑为具有中国政府背景的虚假信息组织,随后,在韩国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韩国时报》以及在日本具备一定权威性的《日本商业媒体》等媒体纷纷报道“Spamouflage”是具有中国政府背景支持的虚假信息组织。[①] 而在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中,第 14 条与第 27 条分别“认定”中国发动了虚假信息战并对多个国家进行网络攻击,并在第 30 条中提出北约将加强与日、澳、新、韩在网络安全领域以及虚假信息战中“强大而深化的合作”。[②] 以上情况反映出美国在对华认知域、叙事域的竞争中,从依靠单边式“污名化”手段向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的发展演变。

二、美国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构建的目标

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在国内层面,借助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构建,通过塑造国内舆论环境、转移国内矛盾来获取民众支持,还通过巩固政治共识来维护资本利益实现捞金目的;在区域层面,重视与亚太盟国情报机构间的协作,将其作为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的关键一环,并且联合盟国在涉华虚假信息传播中紧密配合、形成合力,在国际舆论场上通过塑造中国负面形象达到遏制中国的意图;在全球层面,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首要目标便是通过加速北约在网络、情报等议题的“亚太扩员”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以此护持美国全球网络霸权、话语霸权地位。

(一)国内层面:转移国内矛盾、获取民众支持的政治资本、实现政商利益深度捆绑

首先,美国利用网络攻击的归因困境以及“虚假信息行动”转移国内政治矛

① “Meta Fights Sprawling Chinese ‘Spamouflage’ Operation,” The Korea Times, August 29, 2023, https://www.koreatimes.co.kr/www/world/2023/08/501_358089.html; 小林啓倫,“中国が推し進める海外での世論操作工作「スパムフラージュ」にどう対処するか”, JBpress, 2023 年 5 月 28 日, https://jbpress.ismedia.jp/articles/-/75354。

② NATO, “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July 10,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盾。美国政治极化现象愈发严重,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分歧与对立不仅体现在政策主张上,更深入至意识形态层面,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此背景下,“虚假信息行动”成为党派斗争和转移国内政治矛盾的武器,尤其在大选年,破坏性影响尤为显著。基于网络攻击归因性分析的困境,美国能够利用情报霸权、网络霸权的优势地位以及微软、推特、脸书等跨国互联网企业的国际影响力,以伪造、修改的相关报告形成对中国栽赃陷害的“证据链”,这种趋势激发了官员、政客对参与“虚假信息行动”的热衷。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在世界卫生组织溯源认定病毒不可能来源于中国后,将溯源问题委托给情报部门,并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拉拢盟友施压中国与世卫组织,以虚假报告的形式认定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实验室,[①]以此转移民众对特朗普政府抗疫表现的不满情绪。[②] 可见,美国政府借“虚假信息行动”转移民众对经济疲态、社会撕裂等国内政治矛盾的注意力,蓄意挑起“外部威胁”争议,以“国家安全捍卫者”姿态骗取选民支持,巩固政治根基。

其次,美国协同盟伴国家制造虚假民调数据,以此为美国官员、政客获取民众支持提供便利。在一些关于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民调项目中,美国可能会引导民调机构设置特定的问题和选项,以民调机构影响力塑造中国在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不利形象。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发布的中国国际形象调查报告中,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这一主题上设置议程陷阱,在调查设备和软件中设置算法和程序对调查数据进行筛选和处理,调查对象只选择了 16 个发达经济体,却在调查结果部分认为国际社会民意支持率美国远高于中国,从而使民调结果更符合美国的期望(见图 2)。美国及其盟国政客、学者、媒体大肆引用皮尤研究中心涉华虚假民调数据来引导舆论走向,服务于美国的政治战略,并为美国及其盟国的反华政客和反华媒体污蔑和攻击中国提供素材,营造出对中国不利的国际舆论氛围,获取民众支持的政治资本。

---

① Melissa Quinn, “Biden Says He's Asked Intelligence Community to “Redouble” Efforts in Examining Origins of COVID-19,” CBS News, May 27, 2023, https://www.cbsnews.com/news/covid-19-origins-investigation-biden/.

② Kenneth M. Roberts, “Performing Crisis? Trump, Populism and the GOP in the Age of COVID-19,”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59, No. 4, 2022, pp. 1052 ~ 10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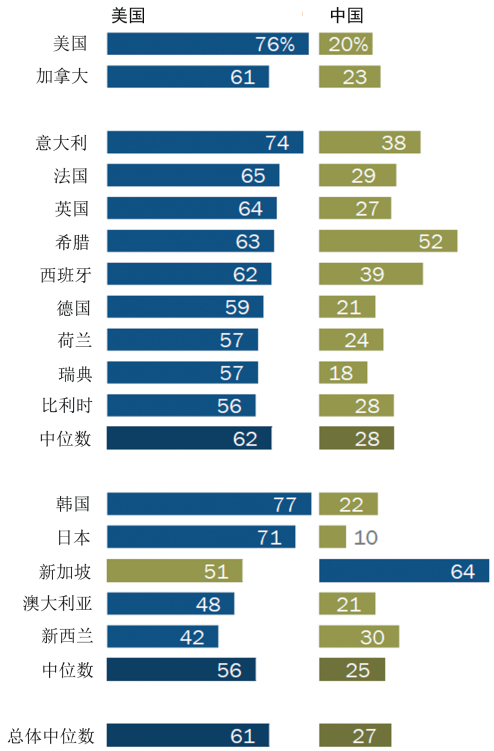

图 2　皮尤研究中心对华好感度调查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 2021 年 9 月全球民意调查结果,参见 https://ropercenter.cornell.edu/ipoll/study/31119062。

再次,美国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维护资本利益,强化政商之间的利益捆绑关系。随着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推进,美国国会加大了对网络安全部门的财政预算投入。拜登政府公布的 2025 财年预算申请文件中,网络安全的预算同比增长 10%,达到 130 亿美元。[①] 巨额财政利益加深了科技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网络安全机构官员的勾结,伴随美国推动“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演变,跨国科技公司能够通过与联盟国家的网络安全部门官员加深利益捆绑以获得巨额订单,实现企业家与政客联合捞金。美国记者布拉德利·布兰肯希普、前

① The White House, “Budget of the U.S. Government, Fiscal Year 2025,” March 11, 2024,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UDGET-2025-BUD/pdf/BUDGET-2025-BUD-26.pdf.

中情局特工爱德华·斯诺登公开披露的资料进一步揭露美国科技公司与美国情报机构、官员勾结的事实。他们指出,“棱镜计划”仍在运作,《外国情报监视法》第 702 条加深了科技公司与情报机构、官员的勾结腐败。[①] 美国保守派公益组织“第一法律”也揭露了情报机构、媒体、科技公司的勾结腐败,并指出拜登政府秘密推动对“中国病毒论”宣传的“虚假信息行动”。[②] 综上可见,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中,美国多个部门、机构协调一致又各有分工:美国政府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为情报、网络战部门争取巨额预算拨款,维系军工复合体利益链;情报机构借助大数据分析,操控信息流向,精准投放虚假信息,针对特定群体洗脑;各类媒体为逐利,放松事实核查,放任虚假信息传播,塑造有利于所属利益集团的虚假信息舆论环境。

(二)区域层面:影响欧亚国家民众对华负面认知、加深中国周边国家对华敌意

一方面,美国通过联合盟国共同塑造对华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整合盟伴资源、广泛传播虚假信息以塑造公众对华负面认知。美国以网络霸权、情报霸权、叙事霸权的优势地位拉拢英、澳、加、新等“五眼联盟”成员以及日本、韩国、欧盟部分国家的情报部门,搭建起一个庞大且隐秘的涉华虚假情报共享网络,形成有利于美国涉华虚假信息传播的网络空间规则。美国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常常主导这一虚假信息传播流程,把通过网络监控、特工渗透、卫星侦察等手段获取的碎片化信息,经过精心拼凑、歪曲后,包装成所谓“权威情报”,传递给盟伴国家。例如,在涉疆问题上,美国情报机构以“新疆分裂势力”分子编造的“悲情经历”为基础,构建涉疆虚假信息,[③]并通过情报共享、信息传播协同等方式,利用情感聚焦博取国际关注,依托认知连接强化虚构谎言,最终推动行为转变、动员盟友对中国实施制裁等,促使欧洲、亚太国家民众形成对中国人权的负面认知。[④]

---

① J. D. Tuccille, “Spying Abuses are Still a Concern, 10 Years After Edward Snowden”, May 24, 2023, https://reason.com/2023/05/24/spying-abuses-are-still-a-concern-10-years-after-edward-snowden/.

② America First Legal, “AFL Sues Two Federal Agencies for Hiding Federal Collusion with Big Media and Big Tech to Censor Information and Shape Public Opinion,” November 4, 2022, https://aflegal.org/afl-sues-two-federal-agencies-for-hiding-federal-collusion-with-big-media-and-big-tech-to-censor-information-and-shape-public-opinion/.

③ 陈璟浩、谢献坤:《国际涉华突发事件国内外网络舆情对比分析》,《情报杂志》2022 年第 3 期,第 114 ~ 120 页。

④ 靳晓哲:《美国对新疆的人权污名化及其逻辑》,《人权》2022 年第 2 期,第 172 ~ 194 页。

同时,美国还推动建立跨大西洋、跨太平洋的情报协作专线,与欧洲盟友及亚洲伙伴实时共享涉华虚假情报动态,确保各方在关键议题如南海争端、“华为 5G 技术威胁论”上信息版本一致,能在同一时间、以相同论调通过多渠道方式对各国用户精准投放虚假信息情报,共同推动欧洲、亚太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吸引中国周边国家参与,诱导这些国家在叙事域、认知域等方面与中国形成对立关系。相较于以往各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态度的反复,近年来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的参与者数量更多且互动联系更密切。美国推动北约及其亚太盟伴协同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方面进行联盟化构建,北约、七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已成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重要平台。例如,2023 年 5 月七国集团广岛峰会发布的联合声明文件,指责中国破坏经济秩序,强迫劳动侵犯人权。[①] 在此过程中,美国及其盟国以主流媒体为平台,围绕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进行情报共享与信息传播协同,使美国盟伴与中国产生对立态势。美国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利用其国际影响力与广泛传播渠道,与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法新社等欧洲老牌媒体协同发声,在报道中国新闻时,常摒弃客观性原则,采用选择性报道、歪曲事实、恶意剪辑等手段,炮制涉华负面新闻。[②] 例如,在新冠疫苗问题中,美国通过“东南亚战略信息中心”等机构,利用数百个虚构的社交账户(其中不乏积累了数万关注者的账户,它们使用菲律宾本土语言发布信息),质疑来自中国的医疗物资和疫苗的安全性,包括“中国科兴疫苗有效率不足 30%”等虚假数据,试图通过抹黑中国科兴疫苗,煽动当地民众对中国疫苗的质疑,打压中国在菲律宾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③] 根据菲律宾主流媒体 ABS-CBN 新闻报道,社交媒体对科兴疫苗效力和安全性的虚假宣传,导致菲律宾部分民众因信任虚假宣传

① European Council, “G7 Hiroshima Leaders’ Communiqué,” May 20, 2023,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3/05/20/g7-hiroshima-leaders-communique/.

② Pauly Mozur and Chris Buckley, “Spies for Hire: China’s New Breed of Hackers Blends Espionage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8/26/technology/china-hackers.html.

③ Chris Bing and Joel Schectman, “Pentagon Ran Secret Anti-vax Campaign to Undermine China During Pandemic,” Reuters, June 14, 2024,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usa-covid-propaganda/.

而对接种中国疫苗产生疑虑并延迟接种。[①] 可见,疫苗外交舆论已沦为美国“虚假信息行动”的工具,暴露了美国借助盟伴媒体资源、主导国际舆论风向、服务自身政治私利的企图,以诱导国际社会对涉华虚假信息认同的方式,引导中国周边国家、美国盟国在叙事域、认知域等方面与中国形成对立关系。

(三)全球层面:加速北约在网络、情报等议题领域的“亚太扩员”

美国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进一步落实北约在网络安全、情报信息等领域的“亚太扩员”。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第十条对联盟成员身份的限定,导致北约在程序上难以在亚太地区扩员,只能以“北约 + X”的形式与美国的亚太盟国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②] 其中,地缘因素的影响使北约需要投入较多联盟成本才能将影响力投射至亚太地区,而网络安全合作、情报信息共享等议题的特殊性,使美国能够借此摆脱北约“亚太扩员”的地缘因素限制,并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强化跨大西洋安全和跨太平洋安全的捆绑关系。

“伏特台风”事件就映射出美国推动北约“亚太扩员”的实践路径。2023 年美国官方与微软等科技巨头协同发声,宣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频遭来自名为“伏特台风”组织的网络侵袭。微软公司在技术报告中,率先将该组织定位为受中国政府支持、隐匿于中国境内的黑客团体,自 2021 年起便锁定关岛及美国本土关键设施,展开长期、蓄意的恶意网络行动。[③] 同时,美国以“网络安全威胁”为黏合剂,拉拢北约国家与亚太盟伴,在网络空间领域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微软公司技术报告发布后,“五眼联盟”成员国的网络安全主管部门迅速跟进,联合发布预警通报。在溯源环节,他们蓄意忽略关键技术矛盾,将本可溯源至东欧、南亚等地的 IP 地址强行关联中国。而在预警通报中,美国夸大“伏特台风”攻击的规模与危害,声称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已处于“崩溃边缘”,并协同多国官方

① Jasmin Romero, “Vaccine Experts Battle Misinformation from Anti-vaxxers,” ABS-CBN, August 23, 2021, https://www.abs-cbn.com/news/08/23/21/vaccine-experts-fight-misinformation-from-anti-vaxxers.

② James Boutilier, “Can NATO Find a Role for Itself Vis-à-Vis China?” December, 2012, https://ciaotest.cc.columbia.edu/wps/nat/0031930/f_0031930_25926.pdf.

③ Microsoft Threat Intelligence, “Volt Typhoon Targets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with Living-off-the-land Techniques,” May 24, 2023,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ecurity/blog/2023/05/24/volt-typhoon-targets-us-critical-infrastructure-with-living-off-the-land-techniques/.

广泛传播虚假信息,塑造公众对网络安全集体认知偏好的国际共识。[①] 美国国会内反华议员借此追加网络战预算、加强对华技术封锁,借“国安危机”之名获取政治资本并深化政商之间的利益捆绑。《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多次刊发专题报道,在标题、导语与内容编排上刻意突出“中国黑客”“恶意渗透”等词汇,配合官方塑造中国网络威胁的虚假信息舆论环境;[②]随后,美国各类网站批量转发、评论、引用《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报道,提升“伏特台风”事件在国内、国际层面的热度,[③]诱导不明真相的民众在意见一致的网络舆论观点中形成集体偏好认知,对中国国际形象认知产生消极影响。

美国还推动七国集团峰会、四方安全对话等多边机制与北约在亚太地区进行合作与协调,强化北约与亚太联盟在议题上的联动作用,加速北约“亚太扩员”。例如,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友多次发表涉华不当言论,试图将七国集团打造成针对中国的政治联盟,同时也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扩员创造有利条件。[④] 同时,美国肆意制造有关小米公司存在远程激活的内置功能的虚假信息,并通过“五眼联盟”编造中国华为公司技术存在“后门”、微信存在针对海外讨论的内置审查与监控、字节跳动公司平台内置有利于中国舆论环境的舆论引导议程等“虚假新闻”,以此抹黑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挑拨它们与中国的矛盾,促使它们更加靠近北约。[⑤] 美国还试图将北约联盟体系与亚太联盟体系进行议题功能上的联动,拓宽其全球联盟体系联合的运作空间。美国利用其在北约中

① American Cyber Defense Agency, “PRC State-Sponsored Actors Compromise and Maintain Persistent Access to U.S.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February 7, 2024, https://www.cisa.gov/news-events/cybersecurity-advisories/aa24-038a.

② Cate Cadell and Joseph Menn, “FBI Says it's Shut Down Sources of Recent Chinese Infrastructure Hacks,”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4/01/31/china-volt-typhoon-hack-fbi/.

③ David Jones, “CISA, FBI Confirm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trusions by China-linked Hackers,” February 8, 2024, https://www.utilitydive.com/news/cisa-fbi-critical-infrastructure-china-hacker/706979/; Aida Oleiwan, “Chinese Volt Typhoon Hack Threaten US Infrastructure, FBI Says,” October 14, 2024, https://insidetelecom.com/volt-typhoon-hack-threaten-us-infrastructure-fbi-says/.

④ U.S. Department of State, “G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at the High-Level Week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9, 2023, https://2021-2025.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meeting-at-the-high-level-week-of-the-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

⑤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eeks to Reshape the Global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eptember 28, 2023,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3/10/HOW-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EEKS-TO-RESHAPE-THE-GLOBAL-INFORMATION-ENVIRONMENT_508.pdf.

的主导地位,积极推动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加强政治对话和军事合作,并通过联合军演、情报共享等方式,增强北约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2022 年 5 月和 11 月,韩国和日本分别宣布正式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此举进一步拓展了北约“亚太扩员”的运作空间。日本安全和技术网络高级分析师长岛纯提出,应借鉴日本—北约“量身定制伙伴关系计划”在日本设立“印度—太平洋地区研究中心”,作为北约驻日本联络处之外的公私跨部门“卓越中心”,其内容包括涉华“虚假信息”以及对华供应链、半导体等合作问题。[①] 同年,韩国和北约也通过了“量身定制伙伴关系计划”,计划在网络安全、涉华虚假信息等方面加强合作。[②] 可见,美国意图实现北约与亚太联盟体系在特定议题上的联动,以此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构建,规避北约“亚太扩员”的地缘因素限制。

三、美国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构建的影响

美国从单边污名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演变至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构建,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国内层面,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不仅固化了民众对华负面认知,还沦为美国官员、政客攫取政治资本的工具,进一步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与转圜;盟伴层面,美国盟伴国家对美国网络霸权、情报霸权优势地位具有战略需求,其国内主流媒体与公众舆论受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影响,阻碍了中国与美国盟伴关系的正常发展;国际层面,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加速了北约“亚太扩员”进程,破坏了国际合作、安全局势以及全球信息生态,对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一)国内层面:固化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结构,影响中美关系发展

美国构建的“虚假信息行动”联盟严重破坏了美国社会的信任体系,致使民

① 長島純,“「必然のパートナー」として中核的研究センター設置への提言・岸田総理のNATO 首脳会合への出席が示唆するもの?”2023 年 7 月 21 日, 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nagashima_17.html。

②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Tailored Partnership’ with NATO to Boost Security Cooperation,” July 13, 2023, https://lby.mofa.go.kr/eng/brd/m_5674/view.do? seq=320840.

众对政府、媒体等关键机构的信任度大幅降低,进而引发社会的分裂与不稳定。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机构,其决策和行动的公信力至关重要。然而,美国政府在处理诸多事务时,被曝光存在发布虚假信息或隐瞒真相的情况。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22年民调显示,仅36%的美国人相信政府关于外国干预选举的声明,而高达58%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夸大威胁以推进自身议程”。[①] 另外,本文还对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所自2020年至今发布的五版《全球数字新闻报告》进行了文本分析,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网络、媒体、政府的信任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美国民众认为网络、媒体已成为政府机构操纵舆论的手段,其中充斥着大量政治化的虚假信息(见表2)。

表2　　美国民众对虚假信息的担忧及其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度

年份	美国民众对虚假信息的担忧	美国民众对网络、媒体的信任度
2020	67%(56%)	29%(38%)
2021	63%(58%)	29%(44%)
2022	/(54%)	26%(42%)
2023	65%(56%)	32%(40%)
2024	72%(59%)	32%(40%)

资料来源:根据2020-2024年牛津大学路透社新闻研究《全球数字新闻报告》的数据制作,括号内数据为世界平均水平。[②]

尽管美国民众对政府信息信任度偏低,但美国两党对华强硬态度的高度趋同,在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过程中分歧明显减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

① Dina Smeltz, Ivo Daalder et. al., “Pivot to Europe: US Public Opinion in a Time of War Results of the 2022 Chicago Council Survey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October, 2022, https://globalaffairs.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0/2022%20Chicago%20Council%20Survey%20Report%20PDF.pdf.

② 2020年数据参见: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0-06/DNR_2020_FINAL.pdf, p.15;2021年数据参见: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1-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1_FINAL.pdf, p.10, p.22;2022年数据参见: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2-06/Digital_News-Report_2022.pdf, p.10, p.26;2023年数据参见: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3-06/Digital_News_Report_2023.pdf, p.17, p.24;2024年数据参见: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sites/default/files/2024-06/RISJ_DNR_2024_Digital_v10%20lr.pdf; p.17, pp.24~25。

众对涉华信息报道的信任极化趋势。此外,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影响了公众对观点一致且传播范围极广的虚假信息的信任度,导致民众对涉华虚假信息的信任度升高,弥合了精英对华强硬、民众对华友好的“认知鸿沟”,从而固化了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结构。2025 年 2 月,埃隆·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对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调查揭露了美国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中资助媒体、操纵舆论的资金往来黑幕。国际开发署资助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联社和英国广播公司等,以推动符合美国政治议程的报道、进行针对中国的负面宣传,其中仅《纽约时报》在 5 年间就从美国政府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①] 可见,美国政府利用媒体来操纵舆论,逐渐固化民众对华负面认知,使反华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为了迎合两党共识,美国政府官员、政客在竞选及演讲中时常表露反华立场,从而获取民众支持的政治资本。[②] 在其当选后,他们对竞选诺言的兑换进一步延续了美国对华强硬趋势,阻碍了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

(二)盟伴层面:操纵舆论环境,对美国盟伴与中国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近年来,美国通过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操纵舆论环境,使盟伴国家形成对华负面认知。美国为巩固其全球霸权地位,在构建“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的过程中,联合盟国共同参与涉华虚假信息的炮制与传播,进一步引导他国民众对中国形成负面认知。例如,在伦敦国王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联合报告中,对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间在英国媒体《每日电讯报》《卫报》《英国广播公司》《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发表的超过 1000 篇文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英国媒体涉华报道主要呈负面性,民众对华认知受到极大影响。[③] 此外,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主流媒体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影响下,涉华报道总体趋于

① http://www.usaspending.gov/search/?hash=df3b05a6103157b57b57875ae74bd1077.

② 孙冰岩,王栋:《美国中期选举涉华议题背后的国内政治变化》,《国际关系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101~132 页。

③ Tim Summers, “Shaping the policy debate: How does the British media present China?” https://www.kcl.ac.uk/lci/assets/2024/british-media-china.pdf.

负面,大幅提升了虚假信息对民众的误导性,加剧了这些国家民众的对华负面认知。[①] 例如,韩国的政治人物利用韩国年轻人“亲美反华”认知拉选票,尹锡悦就曾公开表示对华强硬言论是吸引年轻人选票的策略,有助于获得 20 ~ 30 岁反华认知的年轻人选票。2023 年公布的《日中共同民意调查》显示,日本 80.2% 的受访者认为日本网络、媒体涉华报道充斥负面信息,受此影响,近八成受访者就表示不愿意与中国进行人文交流,调查数据创历史新高。[②] 美国构建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炮制传播涉华负面信息,在“伏特台风”一案中尤为凸显。在“五眼联盟”国家联合发布有关“伏特台风”报告后,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多国主流媒体默认有关“伏特台风”为中国政府支持的网络攻击组织这一说辞。《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伏特台风”是一群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网络攻击者,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科斯将联合启动予以应对的网络联盟。[③] 印尼主流媒体 CNBC 雅加达社论同样默认了名为“伏特台风”是中国黑客组织的说法。[④] 新加坡受众最多的华文综合性日报《联合早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黑客攻击已成为中国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一个强大工具,中国资助的黑客攻击了高价值的地缘政治目标。[⑤] 可见,美国试图以深度伪造的“证据链”为基点,联合其盟伴共同参与对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以此操纵舆论环境,并利用其全球联盟体系的强大影响力影响盟伴国家民众对华认知。

然而,美国盟伴在参与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进程中,本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稳定亦受到负面影响。例如,澳大利亚在参与美国涉华虚假信息传播后,国内舆论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执政期间,多次配合美国

---

① 张悦、谷棣:《韩国人看中国,心态为何发生变化?》,环球网,2023 年 4 月 21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CZijiNh2bX.

② 言論 NPO,“中国人の半数を超える人が、世界で核戦争が起きると回答。その理由はロシアのウクライナへの対応—第 19 回日中共同世論調査結果を公表しました,” 2023 年 10 月 10 日, https://www.genron-npo.net/world/archives/16585.html。

③ ZDNET Japan Staff,“JPCERT/CC、「Volt Typhoon」関連型サイバー攻撃への注意喚起情報を発表,” 2024 年 6 月 25 日, https://japan.zdnet.com/article/35220605/。

④ Redaksi, “Hacker China Bikin AS Ketakutan, Ini Profil Volt Typhoon,” CNBC Indonesia, May 26, 2023, https://www.cnbcindonesia.com/tech/20230526132454-37-440995/hacker-china-bikin-as-ketakutan-ini-profil-volt-typhoon.

⑤ 《疑似与中国大陆官方有关的黑客组织入侵台湾研究中心》,联合早报,2024 年 8 月 2 日,https://www.zaobao.com/realtime/china/story20240802-4415645。

散布所谓“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的虚假信息。对此,一些澳大利亚民众和媒体对政府盲目跟随美国、发布不实涉华信息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许多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指出,这种说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对中澳经贸关系的恶意破坏。澳大利亚的一些媒体也发表评论文章,批评政府的行为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战略需求,而忽视了澳大利亚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形象。[①] 国内政治生态的分歧加剧了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转圜的难度,同时造成了社会生态的不稳定。可见,美国利用盟伴网络操纵舆论并诱导民众形成对华负面认知,使国际社会形成有利于美国虚假信息传播的网络空间环境,不仅在叙事域、认知域等方面阻碍了中国与美国盟伴关系的正常发展,而且损伤了盟伴的国家利益。

(三)国际层面:破坏国际合作、安全局势以及信息生态,恶化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环境

美国“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构建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多方面的冲击。一方面,虚假信息的泛滥破坏了国际信任基础。各国在面对海量真假难辨的信息时,不得不投入更多资源用于甄别,这使得国际关系中的猜忌与防范心理加剧,国际合作的成本大幅提升。例如,美国利用盟友网络,不断散布“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等虚假信息,破坏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拓展,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在基础设施、贸易、通信等领域的合作项目推进,干扰了中拉之间正常的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同时,在气候变化协定落实等议题上,美国以“虚假信息行动”为自身制造舆论优势,让各方对彼此意图和履约能力产生怀疑,阻碍了国际社会的合作进程。

另一方面,美国构建“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消极影响。2022 年,韩国和日本相继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这意味着北约“亚太扩员”的原则性突破对地区安全环境带来了较大影响,并为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

① 根据《西澳大利亚人报》报道,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安德鲁·弗雷斯特在公开演讲中表达对澳大利亚政客“反华论调”的不满,声称盲目跟随美国影响澳大利亚国家经济利益,参见:Dominic Giannini and Andrew Brown, “Ditch ‘Reds under the Bed’ Scare: Forrest Urges Coalition,” The West Ausralian, February 18, 2022, https://thewest.com.au/politics/disrespect-on-national-security-attacks-c-5742302。

联合拓宽运作空间。随着美国推动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北约亚太化进程不断提速,客观上营造了美中阵营对抗的局面,并对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环境的发展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并且,美国通过操纵舆论,不仅能向对手施加压力,还能强化对盟友的控制,巩固自身霸权地位,在核军控等议题上传播“中国威胁论”,制造地区核军备竞赛,破坏地区安全格局。

此外,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对全球信息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网络信息、新闻媒体的极端政治化、“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演变导致民众对政治类新闻、信息的兴趣下降、选择性回避以及新闻疲劳,虚假信息的负面性提升了他们对网络空间、情报信息环境的担忧。[①] 在此过程中,参与虚假信息宣传的主流媒体也因此付出了公信力受损的代价,并提升了民众对信息的辨别难度和对信息透明度的需求。例如,美国政府以“安全威胁”等为由对 TikTok 进行打压,却未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这种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引发了各国民众的不满和质疑。在此情况下,大量网民注册成为小红书用户,并开始在中国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交换多种社会问题的信息,如种族歧视、治安状况等,一定程度反映了各国民众对了解社会真实情况的需求。[②]

最后,大国之间的虚假信息战已成为国际合作的巨大阻碍,从而恶化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环境。北约《华盛顿峰会宣言》中提出北约将加强与日、澳、新、韩在网络安全、虚假信息的合作,并以所谓的“反制中国的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为目标”,将美国深度伪造的“证据链”作为“事实”,通过多国联合协同广泛传播虚假信息,迫使国际社会形成有利于虚假信息传播的网络空间规则,公然营造网络安全、虚假信息等议题领域的阵营对抗,甚至会造成中美在网络空间、情报信息、虚假信息等议题领域的军备竞赛。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塑造于己有利的虚假信息舆论环境,干扰各国政策协调与行动落实,使国际社会为净化信息生态、重建信任付出了高昂代价。并且,在网络空间国际法律法规尚未完全成熟的背景下,

① Nic Newman, “Overview and Key Findings of the 2024 Digital News Report,” Reuters, June 17, 2024, 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digital-news-report/2024/dnr-executive-summary.

② Madison Malone Kircher,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to TikTok?”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10/style/tiktok-ban-alternatives.html.

由美国主导的阵营对抗将全面破坏网络空间合理运行规则，并提升网络空间治理难度，阻碍国家间网络安全、情报信息合作交流以及全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进程。

四、结　　语

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的联盟化，以固化民众对华负面认知结构、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加速北约“亚太扩员”为目标，客观上损害了网络、媒体的公信力，破坏了网络空间安全秩序，阻碍了国家间的人文交流，恶化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环境。随着人工智能深入发展以及全球大数据样本普及率提升，美国涉华“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发展将愈发复杂多变。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量子加密通讯掩护下的信息传输，将使虚假信息伪装得更逼真，传播路径更隐蔽；另一方面，“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平台及成员可能拓展至新兴领域与非传统伙伴，美国或拉拢科技巨头、网络非政府组织，利用数据、平台、人员优势，构建更庞大、细密的网络，形成对美国全球联盟体系的网络安全补充内容，全方位渗透国际舆论场。

因此，中国可以从多个维度加强和完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以此应对美国“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的演变。

从短期来看，由于美国“虚假信息行动”联盟化演变正在当下对中国国际形象造成损害，打破西方媒体垄断叙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应作为优先实施策略。对此，中国可组建专业的国际舆情监测团队，借鉴欧盟“East StratCom Task Force”模式，[①]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全时段监控全球范围内的重大涉华虚假信息，随时启用应急响应机制进行多渠道、多语种的回应，及时澄清事实真相。同

① “East StratCom Task Force”是欧盟为应对虚假信息等问题而设立的一种战略传播与信息应对模式。其主要目的是对相关地区的信息环境进行监测，分析虚假信息的趋势、来源和传播路径等，追踪和记录被认为是虚假、扭曲或片面的信息案例，同时，制作多种传播产品，通过社交媒体渠道、电视、其他媒体和公共活动等进行传播，开展沟通宣传活动，有效提高了欧盟在东欧国家的传播水平。参见 The Diplomatic Serv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Questions and Answers about the East StratCom Task Force,” October 27, 2021,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questions-and-answers-about-east-stratcom-task-force_en。

时,可拓展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国际合作范畴,邀请有影响力的自媒体参与中国真实情况的实地报道,借助它们的传播渠道和受众基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从中期来看,中国需改善信息传播机制,破解西方“价值观同盟”,构建南南合作叙事共同体。对此,中国可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第三方平台,发布基于卫星遥感数据的“一带一路”项目环境影响、民生改善可视化报告,通过第三方数据对冲“债务陷阱”指控。同时,联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舆情共享数据库,对东南亚、非洲等中国影响力关键区域进行优先覆盖。

从长期来看,应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推动建设数字时代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对此,中国可推动相关国际组织设立专门的虚假信息治理机构,协调各国行动,制定统一的信息真实性核查标准与规范。同时,助力完善网络空间国际法律法规,对国际网络行为予以规则上的约束,依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网络安全现代化发展,建设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逐步扭转“被动澄清”局面,推动数字时代的国际信息治理改革。